

抗战全面爆发前 国民政府的粮食储备研究

叶 宁 吕 毅 郑子律 / 著

KANGZHAN QUANMIAN BAOF AQIAN
GUOMIN ZHENG FU DE
LIANGSHI CHUBEI YANJIU



四川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叶宁，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讲师，201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先后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过“从洋务到洋务派：关于“洋务派”一词的形成问题”、“从丰收成灾到颗粒无收：浅析1931年水灾后的政府决策对1932年粮食跌价的影响”、“四川省物价平准处与抗战时期四川的米价平准”等文章。

吕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1级博士，主要从事民国档案采集整理研究，已出版《中国城市史研究》等著作。

郑子律，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3级博士，主要从事民国史研究。

抗战全面爆发前 国民政府的粮食储备研究

KANGZHAN QUANMIAN BAOFAQIAN
GUOMIN ZHENGFU DE
LIANGSHI CHUBEI YANJIU

叶 宁 吕 毅 郑子律 /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洁如
责任校对:张伊伊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的粮食储备研究 / 叶宁,
吕毅, 郑子律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614-7806-6

I. ①抗… II. ①叶… ②吕… ③郑… III. ①国民政
府—粮食储备—研究 IV. ①F329.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3410 号

书名 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的粮食储备研究

著者	叶宁 吕毅 郑子律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号	ISBN 978-7-5614-7806-6
印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张	5.125
字数	109 千字
版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http://www.scup.cn>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抗战前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概况 (上)	(7)
第一节 舆论对粮食危机意识的反映	(8)
第二节 1929 年灾荒对南京市粮食供应的影响	(18)
第三节 各省禁米之下南京市政府的因应措施	(24)
第四节 浅析各级政府在粮食管理中的功用	(32)
第二章 抗战前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概况 (下)	(38)
第一节 1931 年水灾后政府平定粮价	(38)
第二节 政府对粮食贸易管理不力	(44)
第三节 1932 年丰收后各地粮价惨跌	(50)
第四节 1932 年政府调剂粮食价格	(59)
第五节 1933 年美麦借款对于粮价调剂的影响	(62)

第六节 国民政府统制粮食的困难·····	(67)
第三章 国民政府迁都与四川的粮食·····	(73)
第一节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经过·····	(73)
第二节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原因·····	(80)
第三节 抗战前人们对四川粮食的关注·····	(84)
第四章 1934—1936 年四川省成都市对建仓积谷的 尝试·····	(89)
第一节 1934 年四川谷价在灾荒中跌落 ·····	(90)
第二节 成都市拟建仓积谷以调剂谷价·····	(93)
第三节 仓储建设中遭遇的各种困难·····	(100)
第四节 各方阻滞之下错过积谷时机·····	(108)
第五章 1937 年四川灾荒中的粮食仓储调查 ·····	(117)
第一节 四川旱灾严重致粮食歉收·····	(117)
第二节 灾荒中省府被迫举办粮食仓储·····	(122)
第三节 国民政府调查全川各县积谷·····	(127)
第四节 调查中暴露各县仓储的问题·····	(131)
结 论·····	(138)
参考资料·····	(147)

绪 论

民国以降，社会各界已倍加关注粮食的管理问题。如何对粮食进行管理，在“继续贯彻”孙中山遗嘱精神的《建国方略》的“实业计划”部分和《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部分中都有涉及。之后，粮食管理问题作为专门话题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比如冯柳堂的《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与郎擎霄的《中国民食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分别评述了上古至清季中国历朝的粮食管理状况。以当时粮食供求状况的角度探究应如何管理粮食的著作有陆精治的《中国民食论》（上海：启智书局 1931 年版）、张心一的《中国粮食问题》（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编译，1932 年版）与乔启明的《中国人口与食粮问题》（上海：中华书局 1937 年版）；以战时粮食管理问题为角度来研究的有尹以瑄的《国防与粮食问题》（南京：正中书局 1936 年版）、陈正谟的《战时粮食问题的解决办法》（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 1937 年版），以及黄霖生、朱通九等的《战时粮食问题》（上海：独立出版社 1939 年版）；从乡村经济的角度阐述

粮食产销问题的著作有翟克的《中国农村问题之研究》（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 1933 年版）、吕平登的《四川农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以及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①；巫宝山的《中国粮食对外贸易》（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印行，1934 年版）则对如何管理粮食的对外贸易进行了分析。

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也颇受时人的关注，主要聚焦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实行的“田赋征实”政策，许多相关的论著和研究资料相继出版。比如徐青甫的《粮食问题之研究》（丽水：浙江印刷厂 1942 年版），针对“田赋征实”后，粮食征收应注意的事项及对其改进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宋同福的《田赋征实概论》（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 1942 年版）、财政部田赋管理委员会《三年来之田赋整理与征实》（重庆：中央信托局制印处 1943 年版）与关吉玉、刘国明的《国民政府田赋实况》上、下两册（重庆：正中书局 1944 年版），则介绍了当时田赋征实后各省开展粮食统制的情况；戴日镛的《战时田赋征实与战后粮食问题》（上海：独立出版社 1942 年版），预测了田赋征实对战后粮食供应状况的影响。自国民政府决定田赋征实以后，“关于田赋改征实物问题，各方即展开许多的论争，赞成反对者各有其人，扰攘不一”，陈明鉴将时人评述田赋征实的论文和当时颁布的关于征实的法

^① 此书虽然是后来出版，但其撰写的时间和反映的内容均属于民国时期

规资料汇集成册，编成《田赋改征实物论集》（永安：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 1941 年版），该书对于研究田赋征实与粮食统制政策的关系，是比较全面的参考资料。

然而对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特别是在粮食储备方面的管理，时人的研究就不是那么充分了，不仅缺乏相关的专著，就连对其进行系统梳理的文章也很少。朱子爽的《中国国民党农业政策》（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1940 年版）虽然零星提到了战前的粮食仓储设置，但全文主要以农业的发展为主线，没有对粮食储备展开系统论述；张梁任的《四川粮食问题》（重庆：震华印书馆 1941 年版）提到了抗战前后四川的一些粮食管理办法，而其主要讨论的却是作者自己认为应如何管理四川粮食，并不是从粮食储备的角度上来论述；闻亦博的《中国粮政史》（未知出版单位 1942 年版）倒是提到了一些抗战以前的粮食管理，但是全书内容叙述的是从战国一直到近代的粮政，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所以论述极其简略，很多问题都未展开讨论。

这种情况极大地影响到当今学界，对国民政府粮食管理的研究被局限于“田赋征实”后的粮食政策，其他方面则鲜有提及。20 世纪 80 年代，秦孝仪在台湾地区主编《革命文献》抗战建国史料，其中的第 110 辑至 113 辑属于“粮政方面”部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7—1989 年版），主要围绕以田赋征实以后各省的粮食管理问题展开，而第 114 辑至 117 辑则是另外单独编辑的“田赋征实”部分（同上，1988—1989 年版），作

为前者的补充，其内容的规模与前者相当。对于抗战全面爆发以前的粮政设施，编者却没有编入相关的史料。祖国大陆的学界也是如此，大量对国民政府粮食管理问题的研究集中于“田赋征实”以后的粮食政策^①，而讨论战前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问题的论文却并不多见，且论文内容零

① 朱玉湘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田赋征实与粮食征购》（《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1期）是笔者目前所见的在新中国建立后最早对田赋征实进行评述的论文；改革开放以后，刘仲麟发表《也谈年田赋征实的税率与税负问题——兼与朱玉湘同志商榷》（《近代史研究》1987年4期）驳斥了朱文中的一些观点，而朱先生也写了《再谈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田赋征实问题——答刘仲麟同志》（《近代史研究》1988年6期）予以回应，由此开启了学界对田赋征实的讨论，此后涉及此问题的论文层出不穷，参见侯德础：《抗战时期四川田赋征实述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6期；陆大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问题及国民党政府的战时粮食政策》，《民国档案》1989年4期；陆仰渊：《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体制》，《安徽史学》1995年3期；虞宝棠：《国民政府战时统制经济政策论析》，《史林》1995年2期；金普森、李分建：《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李铁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政策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3期；陈雷：《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供应与配给》，《安徽史学》2010年6期；罗玉明、李勇：《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政策述论》，《湘潭大学学报》2010年2期；陈雷：《统制经济与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2期；陈雷：《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1期；魏殿金：《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管制政策》，《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6期；汤梓军：《抗战时期四川粮食动员研究》，《求索》2005年10期；曹发军：《试论抗战时期四川物价管制的实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2期；郝银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研究——田赋征实弊失分析》，《历史档案》2010年2期；郝银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中的利益集团关系》，《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2期；方勇：《蒋介石与战时粮食统制》，《历史教学》2012年14期（由于文章太多，未能一一列举）。另外，有一些硕博学位论文也涉及田赋征实的研究，参见陈雷：《国民政府战时统制经济研究》，2008年6月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肖鸿今：《论抗战时期四川田赋“三征”》，2010年4月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王茜：《论抗战时期陕西国统区的粮食管理政策》，2010年6月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散，缺乏系统的论述。有些学者认为“1912年至1937年是一个中国粮食供应比较平稳的时期”，所以在“战前，全国粮食管理并未设立专门机关”，而“在抗战的最初两年，中国农业收成相当不错，粮价尚称稳定，没有跟其他物价一同高涨”，“所以当局并未感到实施粮食管制的急迫”^①。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忽略了抗战以前国民政府在粮食管理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与史实不符。

1931年，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遭受严重水灾，粮食大面积歉收，农村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同年，日本在我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日关系日趋紧张。1933年，日军又进攻热河，攻占长城各口，直接威胁京津地区，迫使国民政府与其签订《塘沽协定》。在这种形势下，国人的抗日情绪高涨，认为“现下我们已经是被压迫到不能不战，不得不战的地步了”^②。然而粮食对于战争的影响非常重大，“战时的政府对于粮食，必须实施各种统制政策，来稳定国内粮食的价格”，“使食粮不生恐慌，而战斗力得以延长”^③。国民政府内部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在1934年的四中全会上，刘峙等提议统制全国粮食，指出“我国现状不外两端：土匪扰攘，外侮凭陵，国脉垂危，千钧一发，一也；农业则赤地千里，荒者故荒，而不荒者亦濒于荒，农村十室九空，流亡载道，良者举失其

① 马军：《国民党政权在沪粮政的演变及后果（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8~17页。

② 周元光：《粮食的战争和粮食的统制问题》，《农声》1934年178期。

③ 蔡声涛：《战时经济与粮食统制政策》，《生机》1933年2卷2期。

所，而莠者转多出路，以致廉耻道丧，生资破产，民族岌岌不可终日，二也”^①。为此，国民政府开始对粮食加强管理，最后选定以建仓积谷为主要办法。笔者将就国民政府在抗战以前对粮食储备的尝试展开专论。其中，又因为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已选定重庆为战时的陪都，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主要以四川为大后方，所以笔者的论述以抗战前的四川省的粮食储备问题为重点。

^① 《统制全国粮食提案原文》，《银行周报》1934年18卷5期。

第一章 抗战前国民政府的 粮食管理概况（上）

从1928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长江下游地区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灾荒，一些城市的米价突然飞涨，而且还经常面临无米可卖的状况，江苏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的措施，试图减轻米荒带来的危害，但因受制于窘迫的财政，功效并不明显。当时主要产米的各省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纷纷实施“禁米政策”。南京市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人口较多，平时依靠外来米源维持，在各省禁米的情况下，米源被阻断，只好通过调节自身的米市场来渡过难关。南京市政府在这次米粮调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组织本市的米商，整合了米粮市场，通过米粮评价委员会实现了对粮价的控制。在这整个过程中，南京市政府与江苏省政府、中央行政机关的互动关系及其各自发挥的作用，展现了当时国民政府粮食管理体制的缩影。

第一节 舆论对粮食危机意识的反映

民国 14 年（1925 年）张慰慈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发文，指出世界粮食问题将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日益严重，认为世界各国“均有人满之患”，有些国家现在还有余力供给别处人民的粮食，“但照他们内部人民增加的速度，恐怕不久也要有自顾不暇之势”^①。考虑到张先生曾负笈美国的经历，他可能更多地是以世界公民的胸怀和视野来看待粮食的紧缺，对于自己祖国的情况却没有侧重的讨论，而此文用中文发表在中国的重要刊物上，也不能不说作者没有任何的针对性。在此之后的很多论述粮食问题的文章中，“人口”与“粮食”常常被关联起来^②，似乎知识界对于粮食问题都怀抱着强烈的危机意识。甚至有人建议大家将微生物酵母作为食料来解决食粮不足的问题^③。刊载这些文章的杂志，大都在上海发行。作为最早

① 张慰慈：《世界人口与粮食问题》，《东方杂志》1925 年 22 卷 2 号。

② 比如杨开渠：《食粮问题解决的新发现》，《东方杂志》1928 年 25 卷 24 号；徐方干：《中日粮食问题的观察》，《东方杂志》1929 年 26 卷 19 号；汉罗：《请一致注意到食粮问题》，《社会月刊》1929 年 1 卷 9 号；王道：《中国粮食问题》，《世界月刊》1929 年 2 卷 2 期，不一而足。张培刚在论述此时期的粮食研究时认为“粮食问题大都仅仅视为与人口相对待的问题，并且多半附于人口论中论述之”，“讨论粮食问题者多宗马尔萨斯之方法”（出自《中国粮食经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3 页），似可为笔者之佐证，故在此仅略举几例。

③ 杨开渠：《食粮问题解决的新发现》，《东方杂志》1928 年 25 卷 24 号。

的通商口岸之一，上海当时已经是对外贸易非常发达的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对于粮食的需求很迫切。“按上海原非产米之区，而人口则倍蓰于内地。且为转口之要埠，附近产米，固然集中于此。即远之，如湘赣米，亦源源来沪，而洋米进口，又每以上海为目的地，故居民粒食，常有恃而无恐”^①，但是如果外间的来源不稳，或者来路不畅通，粮食就会出现紧缺，上海人民的生存就要受到极大威胁。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江苏都督齐燮元与浙江都督卢永祥在宜兴、沪宁线、嘉定、浏河、青浦五个方向展开激战，战火波及的地方都是上海附近的产米区域。而在战争尚未爆发时，上海仅受到“江浙战谣声浪”，便“致波及民食，米价大涨。市民更遭意外恐慌，由非笔墨所能尽述”^②。时人认为其“固为战争之影响，要亦人民自起恐慌，深恐粮绝，争先购买，致予米店以可乘之机，价格因之狂涨”。于是各商业团体在上海总商会的领导下举办平价米的销售活动，“每升计售大洋一角，每人一升起至一斗为止，而淞沪粮食维持会又已举办麦食平价，以补米食之不足”。米行公会在“派员分赴招商太古怡和宁绍各样栈调查”后，指出“长江如安徽芜湖江西淮扬等种米，有三十万包之多，而碾米各厂栈近来沪宁火车因军事关系，停止货车，未有运到”。而走水路的“米船畏惧运

① 静如：《食粮恐慌之根本问题》，《银行周报》10卷33号。

② 《上海粮食问题之救济观》，《银行周报》8卷35号。

兵，不敢载米运申”^①。米商瞿德纯致函上海总商会，直截了当地说：“因缺米原因被军队阻隔，设法疏通，源源而来，价必跌矣！”^②虽然问题十分清楚，但解决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开战之后，情况更加不妙，“裹路来源，完全断绝，粳米存底，益形减少。头号货虽出重价，亦难购得。米店出售，表面虽照限价，但大都于高货之中，掺杂中次之货。以致中次白粳均一跃而售高货之价，故限价亦等于具文而已”^③。

由此来看，此时上海的粮食主要是依靠周边的产米区供应，因而只要它周边的产米区受到影响，其粮食市场马上受到冲击，这是当时普遍认同的观点。遇到粮食危机的时候，虽然也有人会提到要依靠“洋米”来缓解，但是因为进口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并非几天内可以办得到的事情”，而且当时国际金价上涨，由于金银比价的关系，购进粮食反而很贵，所以“就算有洋米进口，价钱也不会退板的”。^④ 现在有些学者认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市场上国米虽然多于洋米，但由于洋米价格低于国米，因而国米价格决定于洋米价格”^⑤，“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洋米不

① 《上海粮食问题之救济观》，《银行周报》8 卷 35 号。

② 《上海粮食问题之救济观》，《银行周报》8 卷 35 号。

③ 《上海粮食问题之救济观（二）》，《银行周报》8 卷 36 号。

④ 《上海粮食问题之救济观（二）》，《银行周报》8 卷 36 号。

⑤ 徐畅：《近代中国粮食进口中的阶段和影响》，《史学月刊》2010 年第 6 期。

征进口税等特权，向我大量倾销，进行经济侵略”^①。但居住在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小商人、工人和贫民等，不是粮食的生产者，他们的食物纯粹要从市场上购买得来，所以他们大多数只是想要粮食价格尽量便宜，大家倒是非常希望可以通过洋米的进口来缓解粮价太高的危机。问题的关键是，粮食生产不同于普通商品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如果粮食出口国的收成也很低，市场上的粮食价格也会高起来，不能轻易形成对国内粮食的价格优势，再加上运输条件的限制、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等诸多原因，进口粮食也不一定能压低国内的粮价。比如 1929 年美国的小麦减产，麦价比上一年“要高十分之一二”，“又加以现在的金价飞涨，银价低落的时期，中国粉厂大概不能输入很多的小麦”。^② 20 世纪 20 年代的舆论还反映出，人们对全国的粮食状况普遍感到悲观，这与有些学者谈到的 20 年代长江中下游的“米荒”^③ 相对应。在上海发生粮食危机时，就有人提出这种现象从表面上看“似属上海局部问题，若进而求之，则所关甚大，实吾国民经济衰颓之现象也”^④。对比光绪年间的米价，上海的粮价确实上涨了不少，比起民初也高出许多，人们根据“物稀则贵物多则

① 徐正元：《中国近代农产商品化的发展与米市的形成》，《安徽史学》1997 年第 1 期。

② 张心一：《今年粮食问题的一种研究》，《统计月报》1929 年 1 卷第 9 期。

③ 苏宏：《民国初年城市粮食供应危机的原因》，《巢湖学院学报》2005 年 6 期。

④ 静如：《食粮恐慌之根本问题》，《银行周报》10 卷 33 号。